

谢国桢与方志学

任芮欣

提 要：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。他对方志的认识是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。在他看来，方志学的流派可以分为“史法”派和“史实”派；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三个阶段。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方志的运用，在南明史、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。

关键词：谢国桢 方志学 以志研史 方志编修 方志评论

谢国桢（1901—1982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，在明清史、学术史、史料学、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皆有重要贡献。因为方志学与明清史、文献学具有密切关系，谢国桢十分重视对方志的收集和使用。以此视角观之，谢国桢在近现代方志学上应占有一定地位。回顾既有研究，学术界对谢国桢的方志研究或者存而不论，或者语焉不详。虽然《中国地方志词典》收录有“谢国桢”词条，但仅点到为止，并未详尽论述。^① 基于此，本文拟对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诸方面作一梳理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 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

谢国桢对方志的收集十分重视，认识也尤为深刻。在谢国桢的藏书中，地理方志学古籍占有相当数量，主要有《横山志略》《卧象山志》《长白山录》《吴地记》《洪武京城图志》《天童寺志》《光福志》《兰亭志》《竹垞小志》《五亩园小志》《学海堂志》《永嘉郡记》《石湖志略》《金陵琐志》《荆州记》《兰州古今注》《新疆礼俗志》《章谷屯志略》《宁古塔记略》《相城小志》《木渚小志》《鸳鸯湖小志》《长安志》《长安志图》《台湾府志》《回疆通志》《哈密志》《重修常昭合志》等。^② 在其历史著述中，方志的考察和引用更为普遍。因此，对于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不可忽视和轻视。

方志的性质问题是考察学者对方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。古往今来，前贤今哲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。大体言之，主要有3种典型性观点：方志为史书说，以章学诚为代表；方志为地理书说，以戴震、孙星衍为代表；方志为史地书说，以傅振伦、黎锦熙为代表。^③ 清季以来，章学诚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，因此方志为史书说具有较大的学术市场。譬如，李泰棻明确主张“志即史”，称“方志者，即地方之志，盖以区别国史也。依诸向例，在中央者谓之史，在地方者谓之志。故志即史，如某省志者即某省史，而某县志者即某县史也”^④。然而，谢国桢虽为历史学家，但并不主张“志即史”，而是认为方志与史书分而不离，二者并非同类但密切联系。他指出：“从古以来历史就是专门的科学，除了志表纪传各体具备的正史和纪事本末、人物传记各种体裁以外，还有与历史相辅而行彼此有牵连关系记载地理风土的书籍，这种书籍也非常繁复，

^① 参见黄苇主编：《中国地方志词典》，黄山书社，1986年，第335页。

^② 参见谢国桢：《瓜蒂庵藏书总目》，谢小彬、杨璐主编：《谢国桢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8册。

^③ 参见薛艳伟：《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16年第8期。

^④ 李泰棻：《方志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，第1页。

所谓‘旁宗之子，蔚为大国’，于是就有‘方志学’。”^①这种认识既承认了方志的特殊性和独立性，又体现出方志和史书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此外，谢国桢对方志学的流派和历史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。从横向看，谢国桢把方志流派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。他认为：“编修方志之学，本有注重史法的，有注重史实的，注重史法若康海、韩邦靖之言，此文家之言也；注重史实者，此质家之言也。”史实类方志注重保存地方历史资料，如“明末元初士人所编著的地方志书，记事务欲求得其详，如明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志书，都是记载不厌其详的，保存了颇多的历史资料”。史法类方志一开始反对方志过于烦琐，注重精简方志，如明代康海修《武功志》仅3卷，韩邦靖《朝邑志》也只有3卷；其后，有学人专门讲究方志纂修的史法，如章学诚等。^②清代方志学大为发展，从全国性质的《大清一统志》到省、府、州、县，甚至村镇和山水名胜都有志书。就清代而言，方志学也存在史法派和史实派。谢国桢认为，清代编纂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：一派是讲求义例义法的，当以章学诚、李兆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；另一派是致力于考据、综辑事实的，当以孙星衍、武亿、董沛等的作品为代表。^③谢国桢对修志流派的划分方法独树一帜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从纵向看，谢国桢把方志学史划分为3个阶段：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。具体言之，从魏晋到隋末是方志学的雏形期，此时期有记载各州郡的地记，如晋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、晋王范之《交广二州记》、宋张勃《吴地记》等；有记地方政治情况的，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；有记载地方人物的，如魏苏林《陈留耆旧传》等；有记地方风土的，如卢植《冀州风土记》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等。但是总体来看，此时期的志书是零散的记载，记录对象也是个别地方和事情。唐宋时期是方志学的形成期。隋朝出现了图经，唐代出现了全国性质的《括地志》和《元和郡县志》。宋代方志更为繁盛，不仅有全国的志书，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、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；也有分述各地区的志书，如范成大《吴郡志》、周应合景定《建康志》、潜说友咸淳《临安志》等。编纂方法也大为发展，荟萃政治、经济、风俗、物产、人物及地方文献等，容纳众多内容。元明清时期是方志学的繁盛期。元明方志学继续发展，明代的志书编修已推广到省、府、州、县，共有六七百种。但是，明代方志过于芜杂，没有条理。清政府为加强统治，下诏地方修志。这不仅促进方志数量大为发展，也推动方志理论上的成熟，如章学诚对方志理论多有讨论。^④

综上所述，谢国桢对方志学有深刻的认识。在方志性质上，谢国桢主张志书与史书分而不离，相辅相行；在横向上，把方志学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；在纵向上，将方志学分为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3个阶段。

二 以志研史

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。他说：“地方志书，内容丰富，为研究史学及历史地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。所以不可否认，地方志书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”^⑤可见，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对方志的态度是“以志研史”。这也是谢国桢方志

① 谢国桢：《瓜蒂庵文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69页。

② 参见谢国桢：《瓜蒂庵文集》，第167页。

③ 参见谢国桢：《史科学概论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43页。

④ 参见仓修良、叶建华：《章学诚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68—298页。

⑤ 谢国桢：《地理方志学概述》，《历史教学》1982年第6期。

学研究中最重要内容。

第一，方志文献与晚明史研究。晚明史是近代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，谢国桢也先后出版《晚明史籍考》和《南明史》。其中谢国桢就列有相当数量的地理方志文献。这些方志文献多载他书所未有或未详的史料，对明代人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，并不能完全以地方文献视之。

在“明季地方文献人物传记”部分，谢国桢所引志书有《江渚贞烈志》《青门节义录》《越殉义传》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《明季东莞五忠传》《明季潮州忠逸传》《明季滇南遗民录》等。如，“（《青门节义录》）著录诸人，多有他书所未详者，至习见者，若刘中藻、林宰等人，记其行事，颇多异闻，亦足以补南疆逸史等书之缺”^①。在“明季人士所著地方文献”中，谢国桢也列举了众多地理方志书，如《畿辅人物志》《松陵文献》《帝里明代人文略》《嘉禾征献录》《吴门表隐》《海昌五臣殉节遗事》《虞邑先民传》《诸暨贤达传》《东雍耆旧传》。如《松陵文献》“琐事遗闻，多有他书所不载者，直可视为明季稗乘，未可以全以地方文献概之也”^②。在《晚明史籍考》的基础上，谢国桢又撰写了《南明史略》，根据“搜集到的资料，把南明的历史作了简单平实的介绍和评价”^③。其中方志使用也较为普遍，如《米脂县志》《海州志》《费县志》《光州志》《奉化县志》《慈溪县志》《霍邱县志》《清远县志》《揭阳县志》《湖北通志》《云南通志》《甘州府志》等。

第二，方志文献与清初史研究。《清开国史料考》为谢国桢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。在研究建州女真史事的资料时，谢国桢指出方志的重要性，称“记辽东之方志，若《辽东志》《全辽志》等类是也”^④，《辽东志》和《全辽志》“传世甚稀”。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也仅存《全辽志》传抄本与嘉靖刻本，并无《辽东志》。《辽东志》为谢国桢在大连参观“满铁”图书馆时所见，为日本前田侯爵藏明刊本。此外，谢国桢列举了关涉辽东史事的其他方志，如《辽海志略》《山海关志》《四镇三关志》《三卫志》等。他说：“清咸丰间，金州隋汝龄九芻纂《辽海志略》一百六十八卷，记辽事颇详，足补《盛京通志》等书之缺。其他若《盛京通志》《吉林通志》《大清一统志》等书，记掌故者若《八旗文经·作者考》，皆可参考。”^⑤

值得注意的是，谢国桢利用方志批驳日本学者为侵略东北捏造的谬论。为侵略中国，日本汉学界大肆宣扬“满洲非中国论”。日本清史学家稻叶君山指出，“明人曾未涉足其地，山川城站，亦多传闻疑似”。谢国桢认为此论为“无稽臆说”，据史料据理驳斥。《辽东志》就是谢国桢使用的重要证据。谢国桢称：“检本书之卷末，则东北满洲之交通经路，粲然具载。其间海西东水陆城站一节，所记自开原以北至哈尔滨附近，更折向东北，循松花、黑龙两江之江岸，下出于鞑靼海峡，所有驿站，一一详列其中。吾人试按此等站名，就今日地名一为考察，则十之六七总可寻得。”“更自开原东北，行经长白山之北，绕松花江之上源，以出于今之延吉，遵豆满江而南，经朝鲜之咸镜南道，将所有驿站一一检查之，更可得十之七八。”^⑥ 谢国桢以方志为关键史料的研究揭露了日本学者的阴谋，证据扎实，观点鲜明。

第三，方志文献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。1949年后，谢国桢接受唯物史观的理念，意识到

① 谢国桢编著：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747页。

② 谢国桢编著：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，第767—768页。

③ 谢国桢：《南明史略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233页。

④ 谢国桢：《清开国史料考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0页。

⑤ 谢国桢：《清开国史料考》，第133页。

⑥ 谢国桢：《清开国史料考》，第130页。

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，特编撰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。在该书序言中，他指出：“官修之书有着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，那末，要广泛地考究当时的社会情况，就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、私人诗文集和地方志乘，以及各种档案资料了。”^①查之实际，谢国桢特别注意查找方志中的社会经济史料。譬如，在农业生产方面，清《滇海虞横志》对粮食作物落花生的记载，明陈懋仁《泉南杂志》对水果红柑、荔枝的记载，清李调元《东海小志》对大发哈鱼的记述。在手工业生产方面，清《续外冈志》记载有飞花布，嘉靖《徽州府志》《滇海虞横志》《续补全蜀艺文志》有冶矿的记载。在工艺美术方面，《滇南杂志》记有制纱灯。在商品经济方面，《金泽小志》有松江棉花布的贸易；《盘龙镇志》有纺织品的贸易；《清乾隆两淮盐法志》有食盐贸易；《江西省大志》有瓷器贸易；《新安休宁名族志》有商人传记；《沙县志》记有铁矿贸易；《吴江县志》记载有大米的价格及其浮动。在阶级分化方面，《南陆志》《虞谐志》有贫富分化的史料。

第四，方志文献与农民战争史研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谢国桢对农民战争问题也较为关注，先后编写《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》和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。因为农民起义并非限于一时一地，而是广泛地辐射不同地域。所以，谢国桢在研究中除关注官方文书外，还主张“参以地方志、各家文集、野史笔记”^②，以补官方记载的不足。1957年出版的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中大量使用方志。关于河北山东地区农民起义情状，康熙《霸州志》、康熙《保定府志》、民国《雄县新志》、光绪《费县志》、咸丰《大名府志》、乾隆《沂州府志》皆有记载。记载东南地区江浙农民起义情况的方志有嘉庆《海州志》、光绪《溧阳县志》。《奉化县志》有浙江农民军记载。关于中南和华南地区湖北、安徽、江西、广东的农民起义状况，《湖北通志》《霍邱县志》、同治《鄖阳志》、同治《赣州府志》、同治《广新府志》、康熙《宁化县志》、民国《泰宁县志》、同治《南昌府志》、光绪《江西通志》、同治《宜春县志》、道光《新会县志》、同治《韶州府志》、光绪《清远县志》有众多记载。记载山陕甘地区农民军状况的方志有光绪《垣曲县志》、康熙《交城县志》、乾隆《商州县志》、道光《兰州府志》。1981年，《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》出版。其中清张潮《虞初新志》和郑澍若《虞初续志》详细记载了天启年间吴中的市民暴动；《瑞金县志》和《泉州府志》记载了佃农的反抗斗争；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记载顺治三年（1646）南湖一带的奴变；光绪《湖北通志》也有奴变的记载；《台湾府志》记载天启年间台湾对海上武装船队的抗争。

总之，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地重视方志史料的运用，与笔记、文集、官方文书相互补充。在南明史、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等方面，谢国桢“以志研史”的认识得以充分地体现。

三 修志与论志

谢国桢不仅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方志，而且还参与方志的编修工作，在古籍研究中注重对方志进行评论。在方志编修方面，“参加过《黑龙江志稿》《河南通志稿》《绥远通志》的编纂”^③。在方志评论方面，谢国桢重视以版本学和史料学为角度评论其利弊得失，多有一针见血之见。

谢国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参与河南、黑龙江和绥远的省志编修，在方志编修层面也卓有成效。首先，谢国桢与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的编修。民国时期《河南通志》屡修屡停，

^① 谢国桢编：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上册，“前言”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—2页。

^② 谢国桢编：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，“凡例”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1页。

^③ 黄苇主编：《中国地方志词典》，第335页。

目前仅存部分铅印稿和大量手稿。1914年和1921年,河南省曾两度修《河南通志》,均无果而终。1934年,河南通志馆并入河南大学,由河南大学校长兼任馆长。工作到抗战开始,《河南通志稿》大部分已经编纂完成。^①谢国桢参与《河南通志稿》的纂修就是此阶段的工作。正如其自述中所言,“1932年承胡适、傅斯年介绍,到南京前中央大学专任讲师。次年该校介绍我到河南大学任教授,我没有去,可是叫我协助他们编《河南通志》”^②。谢国桢所负责的纂修内容为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。因《河南通志》最终未能成书,仅有部分内容刊印。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也于1942年内部印刷。目前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有河南通志馆纂修的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,为民国31年铅印本。^③

其次,谢国桢与《黑龙江志稿·艺文志》的编修。1914年,黑龙江设立通志局,着手收集史料,撰写初稿,但是最后不了了之。1929年,张伯英重新主持编修,1932年脱稿,1933年印刷。因为尚有疏漏之处,就以“志稿”为名而不用“通志稿”。据“刚主所编之艺文”一语可知^④,谢国桢负责分纂《艺文志》。《黑龙江志稿》卷60—62为《艺文志》,包括“书目”和“文征”两部分,附有“金石”。书目收录黑龙江人所著图书;文征收录对黑龙江的记述之书。1992年出版的《黑龙江志稿》,即根据1933年铅印本整理而成。

最后,谢国桢与《绥远通志稿·民族志》的编修。1931年,《绥远通志稿》开始纂修,1937年初稿完成。“当时遵省主席傅作义先生之意,特派荣祥携稿至北平,延请社会名士傅增湘先生审修订稿。”其后,傅增湘聘请多人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撰组合。^⑤谢国桢参与修撰《绥远通志稿》就是此时期。据自述,抗战时期,谢国桢经傅增湘介绍,“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笔札,并协助傅沅老编纂《绥远通志》”^⑥。谢国桢参与部分为《民族志》。《绥远通志稿》卷50—53为“民族”,主要记载汉族、蒙古族、满族、回族的流变。1940年,谢国桢在《中和月刊》第1卷第3期发表《河套民族变迁考》,即编修《民族志》的部分内容。

因为有多次修志的实践,再加上深厚的文献和史学功底,谢国桢钟爱方志评论,并且往往一针见血,颇有见地。譬如,关于《析津志》,谢国桢对作者、版本源流、内容、体例、方法皆有考察和评论,称:“著者长于勾稽史事,能诗善画,泛览群书,兴趣广博。因之,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。”并且,表彰其“注重调查研究”,“对于地理沿革,民情风俗,也极感兴趣”^⑦。此处以谢国桢晚年在江浙访书时的方志为例,略论谢国桢的方志评论。就其特色言,谢国桢注重从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角度评论方志。

其一,以版本学评论志书。谢国桢所发现的《扬州休园志》为清乾隆壬辰刻本。从版本学来看,“是书为写刻本,刊刻极精,白纸初印”^⑧。在上海图书馆,谢国桢发现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的稿本,评论称:“关于清初后金发迹之事,辽东女真部分,恐触清廷忌讳,颇有删节,惟旧钞本尚存。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,俨然俱在,其中批注之语,字迹极为苍老古朴,审为作者亲笔

① 参见刘永之、耿瑞玲编:《河南地方志提要》上册,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0年,第41—42页。

② 谢国桢:《谢国桢自述》,《文献》1981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河南大学图书馆编:《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》,河南大学图书馆,1987年,第2页。

④ 参见张伯英为万福麟监修、张伯英总纂《黑龙江志稿》所作的序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4页。

⑤ 参见绥远通志馆编纂:《绥远通志稿》,“出版说明”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1—2页。

⑥ 谢国桢:《谢国桢自述》,《文献》1981年第4期。

⑦ 谢国桢:《瓜蒂庵文集》,第164—165页。

⑧ 谢国桢:《〈扬州休园志〉八卷》,《江浙访书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4年,第29—30页。

所写，知为这部书的稿本。”^①关于《华阳国志》，谢国桢发现了明嘉靖甲子成都刘大昌刻本。《华阳国志》为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典籍，有明张佳胤刻本和刘大昌刻本。“张佳胤刻本流传较为广泛，至于刘大昌刻本则流传较少……今四川图书馆又藏是书，书品尤为洁净，诚为蜀中的重要历史文献，可以说是海内外仅存的珍本。”^②

其二，以史料学评论志书。在《香泉志》中，谢国桢发现了秦观的佚文。“宋词人秦少游观曾游此地，著有《游汤泉记》及咏香泉诗词，载于此志之内，为《淮海集》中所未收，足以补其未备。”^③谢国桢之所以著录《横山志略》，主要是为了展现明中后期太湖一带的纺织业。“由这些村镇志书中，可以考察书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工商业发展的情况，实为研究我国社会经济、民情风俗等的重要资料。”^④谢国桢从《香山小志》窥探到了清代建筑家与地方风俗的关系。“香山一地，自明初以来，多出工艺哲匠，如明初蒯祥、徐杲等大建筑家。在明永乐以迄正统，北京天安门与三大殿等各项大建筑，多出蒯祥、徐杲诸家之手……清康熙初年修建太和殿的老工部侍郎梁久亦为香山镇人。”此外，《鲁班经》也为明代苏州书坊所刻。^⑤《重修贵州通志》由明代江东所修，为日本尊经阁藏明万历丁酉刻本。谢国桢评论道：“是书编制体例，详于建置沿革、政治制度、徭役赋税之事，犹可以存有明一代之旧典，而于贵阳一区宣慰司之设置，西南苗夷各兄弟少数民族及其种类风俗，言之颇为详尽。”^⑥

概而言之，谢国桢有丰富的方志编修活动，先后参与河南、黑龙江、绥远省志的编纂。在方志实践、文献学、历史学的基础上，谢国桢还注重对方志书的评论，对于作者、版本、内容等有独到的认识。

结 语

谢国桢不仅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，也是方志学家。然而，对于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成就，学术界尚无全面论述。通过考察可知，谢国桢对方志学的理论认识较为深刻。在方志的性质问题上，他坚持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。在方志学的流派上，他主张方志学可以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；而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3个阶段。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。在实践层面，他主张“以志研史”，这在他的南明史、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等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。此外，谢国桢还参与河南、黑龙江、绥远等省的方志编修，并且注重以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视角对方志进行评论。因此，谢国桢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实践层面皆对方志有独到的见解，为方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(作者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)

本文责编：周 全

① 谢国桢：《〈读史方輿纪要〉一百三十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92页。

② 谢国桢：《〈华阳国志〉十二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160—161页。

③ 谢国桢：《〈香泉志〉不分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35页。

④ 谢国桢：《〈横山志略〉六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52页。

⑤ 谢国桢：《〈香山小志〉不分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58页。

⑥ 谢国桢：《〈重修贵州通志〉二十四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184页。